

潘懋元教育考试思想探析

郑若玲

摘要: 潘懋元教育考试思想主要体现在自学考试、高考、大学学业考试等方面, 尤其聚焦于处理教育与考试的关系、公平与科学的关系上, 是其高等教育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他针对教育考试问题所做的分析, 正是基于其在高等教育历史、理论与实践等方面所积累的深厚学养, 所提改革建议也都富有针对性与可行性, 对中国教育与考试制度的改革与发展曾经产生过并将继续发挥重要影响。

关键词: 潘懋元; 教育考试思想; 自学考试; 高考; 大学学业考试

中图分类号: G40-09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15)05-0127-06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15.05.015

一、潘懋元教育考试思想主要内容

(一)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思想

潘先生是我国最早研究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学者之一, 对我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发展历史、改革成就和前景展望进行了较系统、深入的研究。

潘先生认为,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中国一种很好的、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教育形式与考试制度。由于它是“个人自学”、“社会助学”与“国家考试”相结合, 因此既调动了个人刻苦自学的自觉性, 又动员了社会各方面力量助学的积极性, 并坚持了国家选拔人才的严肃性。以自学为主的学习方式, 使考生能获得比一般大学生更强的学习能力。而且, 自学者克服困难所取得的成绩, 比在校生生所取得的同样成绩有更高的“含金量”, 因为其成绩包含一般在校生生较难获得的自学精神与自学能力, 而自学精神与自学能力是成才的必要条件, 尤其在科技迅猛发展、知识疾速更新的当今社会。然而潘先生也指出, 自学考试也有明显的局限性, 学习者只进行书本的学习和通过考试的认可, 只通过助学与教师进行知识上的交流, 缺乏学校的学习环境与条件, 没有规章制度的约束, 存在缺乏师生互动、校园环境熏陶等先天不足。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正视的客观事实^[1]。

随着大众化时代的到来,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对于新背景下自学考试如何发展的问题, 潘懋元先生也给出了具体的建议, 认为自学考试今后应逐步从“学历教育考试为主”过渡到学历教育考试与职业技术教育考试并重, 如此, 自学考试才能有新的发展空间。在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创立初期, 为了缓和当时“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升学压力, 让有志青年通过自学也能获得高等教育学历文凭, 自学考试被定位为学历教育的特殊形式。1988 年颁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 其定位依然以学历教育为主。但是,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到来, 高中毕业生有充分的机会进入普通高等学校、民办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 自学考试的学历教育开始面临激烈的竞争。而缺乏学校教育的先天不足, 使自学考试没有学历教育竞争的优势。因此, 自学考试应发挥自身没有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世界一流大学多样化招生政策研究”(13JJD880011)

作者简介: 郑若玲, 高等教育质量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福建厦门 361005)

围墙、学制灵活等特点,并与成人、职业及民办等高等院校通力合作、相互协调,除继续满足考生获得高等教育学历文凭的愿望外,需更加重视广大从业人员的职前、在职、转岗等继续教育的短期培训与资格考试。这种定位的变化是根据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与社会生产、生活知识含量的提高而提出的,也符合继续教育、终身教育的理念及学习型社会建构的时代需要^[1]。1999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大力发展远程教育、职业资格证书教育和其它继续教育。完善自学考试制度,形成社会化、开放式的教育网络,……逐渐完善终身学习体系。”这一决定为自学考试在21世纪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机遇。

质量是自学考试的“生命线”,自学考试要想发挥积极功效,应坚守质量底线,不能为了生存而牺牲质量。潘先生从自考建制伊始便强调坚持质量意识是自学考试制度发展的核心。无论哪种教育形式,当数量的增长达到一定限度时,追求内涵式的发展将成为必然选择^[2]。在自学考试前20年的发展过程中,质量成为了自考生命的“守护神”。如今,自学考试面临各种教育形式扩张的冲击,更需坚守质量意识。即使在非学历考试中,也需制定质量标准,严格把关,为社会所需专门人才、技术人才提供相应的资格审定机制。惟其如此,自学考试才能葆有顽强的生命力与足够的竞争力。

此外,潘先生还敏锐地意识到自学考试在促进农村社会发展中具有广阔天地与重要作用,早在上世纪90年代便指出自学考试必须通向农村,而且应成为高等教育通向农村的“排头兵”。在中国,高等教育通向农村是其实现大众化的必由之路。因为农村人口占70%以上,有大量受过高中教育的青年;农村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大批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科学知识的各种人才。无论从生源还是从就业出路来说,高等教育在农村都有广阔的天地。相对于其他高等教育形式,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由于投入少、学制活、能较好地解决人才“上不来,下不去,留不住”的问题,向农村延伸比较容易,并且已经有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例如,浙江省依托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建立乡镇自学考试工作站,作为通向农村的桥梁,成效显著;福建农村致富技术函授大学、福建农林大学联合举办“乡村管理”大专班,以农村基层干部为主要培养对象,为农村培养一大批留得住、用得上的乡土型高素质人才。当然,自学考试通向农村也面临着考生分散、交通不便、师资缺乏、难以组织社会助学等现实困难,影响到考试的合格率和考生的积极性。因此,潘先生认为如何实现自学考试真正面向农村仍是一个需要不断试验与改革的重点问题。采取多种方式解决助学问题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通向农村的关键^[3]。时过境迁,尽管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致力于城镇化建设使得城乡的界限日渐模糊,但自学考试仍然可以凭借自身优势在城镇化建设中发挥作用。笔者认为,潘先生在20年前提出的“自学考试通向农村”的思想并未过时。

(二) 高考思想

高考是最为社会关注的教育改革之一,具有重要的教育与社会功能。学术界对于高考改革可谓聚讼纷纭,且不失尖锐偏激的观点。潘先生则本着客观的学术态度,对高考制度及其改革提出了以下较为中肯的意见与看法。

首先,应该客观看待高考的“指挥棒效应”。考试作为“指挥棒”,是教学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潘先生认为考试“指挥棒”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能因此抵触和否认考试的作用,更不能消极对待。相反,应该积极、恰当地利用考试“指挥棒”来促进教学改革和提升教育质量^[4]。此外,要发挥考试在高校招生中的积极作用。潘先生指出,在我国高等教育尚处于精英教育阶段时,高考起到了选拔优秀大学生的重要作用。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虽然在优质教育资源依旧短缺的条件下,高考仍然起着选拔优秀生源的作用,但其主要功能已经变成为高中毕业生选择适合其个性与能力的高校与专业、引导中学教育的改革与提高等^[5]。

“要使这根指挥棒运用得当,起推动、引导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积极作用,作为指挥棒的招生(高招)考试自身应当首先进行改革。”^[4]潘先生认为“指挥棒”要“运用得当”,包括考试内容和考试方法两个方面。就考试内容而言,现在的考试侧重对学生知识的考测,忽视对学生能力的考察。潘先生认为考试既要考知识,也要考能力,包括记忆力、判断力、想象力、思维能力、应用知识能力以

及创新能力等等,还要测试学生的学术性向,作为学生选择高校与专业和招生部门录取的依据。就考试方法而言,潘先生指出,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高校的办学形式是多样化的,有学术型的研究型大学,也有应用型和职业型的大众化教育,各级各类高校的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不同,考试方法也应该多样化。因此,要改变一份考卷考各个层次、各种科类学生的做法。

其次,高考要与时俱进进行改革。1977年恢复高考之时,高考的录取率只有4.8%,只能通过高考来选拔顶尖的高中毕业生入学。到了1998年高校扩招之前,尽管录取率已达到34%,但“择优录取”的原则还适用。如今,普通高校的录取率已经达到70%以上,有些地方甚至达到了90%以上,高考仍局限于为高校选拔“优秀人才”的选拔性功能受到了质疑。潘先生指出,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高考要从选拔性考试转变为适应性考试,高考的选拔功能要融入到适应性功能,成为其组成部分。传统的高考主要是选拔性考试,反映了精英教育阶段教育资源相对短缺与教育需求过旺的矛盾,也决定了必须要通过统一高考择优录取。但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招生名额逐渐增加,供求总量渐趋平衡,绝大部分的高中毕业生都有上大学的机会,此时高考就会渐渐失去“择优录取”的主要功能,转变成为新生选择适合高校或专业的考试。当然,同一类型的高校或专业,办学质量有高有低、条件有好有差,还是会存在选优的问题,学生也会有选择进入什么高校和专业的问题,潘先生指出这是另外一种选择,即适应性选择问题^[6]。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前提是多样化。高等教育多样化,意味着培养目标与规格、就业渠道的多样化,对考生的要求也将多样化,要求有些学生有丰富的理论知识,有些则有较强的实际动手能力。而一份考卷从清华考到高职再考到民办高校,这种大规模统一考试的单一化是精英教育思想的模式,很不科学。潘先生认为可以采取以下两种处理办法:一是分类型考试。高等教育达到大众化或普及化后,所有合格的高中毕业生理论上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资格,问题是进什么大学、学何种专业?现在的高等教育有研究型、专业型和职业型三种基本类型,因此,至少可以分这几种类型进行考试。二是统考加单考。大规模考试有其局限性,实行单独考试比较理想,但单独考试存在很多实际困难,如学生奔波、人情困扰等。因此,将统考与各校单考结合起来,便能在发挥统一考试规模效益的同时,又兼顾到各校的办学特色。

此外,现在的大规模考试多采用标准化考试,高考自上世纪80年代也引进了这种西方的考试形式。标准化考试名为科学考试,省事省力,实际上很不科学,有其局限性,许多东西考不出来,最多只能考学生的记忆力和判断力,容易扼杀人们的思维能力,而且很容易作弊。潘先生认为今后高考的改革要多从增加命题科学性的角度考虑,既可以增加考试的科学性,又可以防止或减少作弊^[7]。

总之,我国的统一高考制度已形成一套相当完整而牢固的体制和运行机制,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潘先生认为,变革不能像百年前废止科举那样遽尔取消高考,只能采取渐进方式,朝着既定目标,对高考的体制、机制与管理全方位地、经过试点后逐步推进。而且,所有体制、机制、管理的改革都必须以转变思想为先导,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按照“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以人为本的全面素质教育观、多样化的现代人才观,以及适应性的考试功能观来指导高考变革^[8]。

(三) 大学学业考试思想

潘先生认为学业考试是教学过程中一个重要环节,对学生的学习、教师的教学、教学的秩序以及领导工作等方面都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在“文革”期间,考试评分制度被取消,教学效果与学习质量无法检查、无从反映,造成教学秩序混乱、教学质量严重下降。因此,应当认真严肃地对待这一项工作。

潘先生认为,学业考试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检查学生成绩、督促学生学习,尤其是后者。通过检查可以发现学生学习上的优缺点及存在的问题,以长善救失、鞭策学生努力学习;更重要的是促进学生及时复习功课,巩固和加深知识,培养刻苦认真的学习态度和坚强的意志品质。二是反映教师的教学效果。考试既是考学生,也是考教师。学生考不好,则反映出教学或考题上的问题。因此,学业考试是教师自我检验教学效果、总结教学经验、不断改进教学内容和方法、提高

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三是有利于稳定教学秩序、健全学习制度、加强教学管理。学业考试的结果为学校领导与教育行政部门提供了分析教学质量与学习质量、分析教与学所存在的问题的实际材料,是指导教学、教育工作的依据之一。而且,对学生进行严格认真的考试,可以保证学校必要的正常教学秩序,形成严谨好学的良好校风。尽管人们对学业考试进行过种种批评,但实践证明,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一种公认的、能代替考试的、更好的检测教学效果的工具。在今后高等教育逐渐实行“宽进严出”时,更需要考试来严把质量关。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就是明显的例子。质量是自学的生命线,自学考试之所以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靠的就是实行严格的国家考试^[1]。

二、潘懋元教育考试思想聚焦

客观地说,相较于高等教育其他方面的广泛深入研究,潘先生在教育考试方面所述不多,但所论之处均高屋建瓴、切中要害,较准确地把脉了教育考试方面的焦点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的“药方”。其教育考试思想尤其聚焦于处理教育与考试的关系、公平与科学的关系上。

(一) 强调处理好教育与考试的关系

关于教育与考试的关系,潘先生认为教育是考试的目的,考试是教育的手段与方法,是为教育服务的。

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学校教育是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和受教育者个人发展需要,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培养人的活动。学校教育主要是通过教学来实现的,而教学过程包括课程和教学形式。教学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狭义的教学专指知识讲授型的课堂教学,广义的教学则包括启发思维式的自我生成型教学、科学实验和社会实践型教学等等,除此之外还有反馈、评估的教学,比如考试就是其中之一。因此,考试作为一种广义的教学方法,也是为学校教育目的服务的。潘先生指出,教学有两方面的功能。其一,针对学生而言,主要是检查和评定学业成绩、反映学生学习效果。通过考试,可以较为直观、真实地反映出学生掌握了哪些知识、达到了什么水平,哪些方面还有待加强、存在哪些不足。考试分数可以用于评定学生课程是否及格或者决定一名学生能否升级、毕业。高考则是一种特殊的考试,是检查、评定学生能否升学以及适合上哪一所高校哪一类专业的考试。其二,针对教师来说,考试能检查和评定其教学效果。学生可以从学业成绩中了解自己的学习效果,教师则能从学生个体或学生群体的考试结果中了解自己的教学效果,根据考试反馈的结果发现问题,及时调整和改进教学工作。

因此,潘先生认为,“无论是何种性质的考试(教育性考试),都是为了给人以一种反馈信息,评估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教师的教学效果,以便提高教育质量。考试只是一种方法,教育才是目的”。但是长期以来,人们都混淆了教育与考试之间的关系,将其本末倒置。潘先生指出应试教育就是将目的与手段颠倒的典型。学生学习什么内容、教师教授什么内容完全是为了应试。考试本应是教育的一种手段和方法,考什么样的内容、如何考试都要符合教育的目的,服从培养人的最高准则。但是现在的很多做法背离了教育目的,学生重在“题海战术”、教师重在讲解考试内容,甚至出现了猜测考题、强记考试标准答案等现象。潘先生指出,“一切为考试服务”的应试教育对素质教育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这些应试的做法有损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目的。应试教育愈演愈烈,素质教育只能停留在理论上、口头上;中学的“课改”也举步维艰。从“片面追求升学率”到“扎扎实实推行应试教育”,它的基础就是统一的高考制度。如此颠倒教育与考试之间的关系,不利于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7]。

(二) 注意处理好公平与科学的关系

公平性和科学性是考试的永恒价值追求,各级各类考试都是如此。潘先生认为只有兼具公平性和科学性的考试才是合格的考试。

考试对公平的诉求缘于几千年来民众对公平、正义、平等的向往。早在古代,我国便有了“不

患寡而患不均”、“均无贫”等朴素的公平价值理念。隋唐科举建制以后，儒家“学而优则仕”思想更是成为这一考试制度得以延续和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它客观上要求科举制为社会成员提供平等竞争的机会，并对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逐步形成“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选才标准。科举考试制度也在长期实行和发展过程中，不断强化着“公平、公正”的精神以及“考试面前人人平等”、“分数面前择优录取”等原则，进而影响了近代以来的各类大规模考试。提到考试，尤其是高考，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将其与科举考试作对比。潘先生认为，人们之所以将高考与科举考试相联系，主要是因为前者在公平、公正方面与后者一脉相承，都是竞争性的选拔考试，都提倡“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统一高考最受赞扬的就是高度的保密、严格的评分、公开的划分数线，按考生总分高低排序、依次录取，进入性质、层次、科类不同的高校、专业。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老百姓对高考公平性的肯定，高考俨然已经成为老百姓眼中公平的代名词。潘先生据此认为公平作为高考首要的价值诉求，应该不断坚持和强化，改什么都不应改掉公平，这是底线^[1]。

科学性是考试的另外一大诉求。考试尤其是高考，承担着选拔大学优质生源的重大使命，如何通过考试选拔优秀人才就涉及考试科学性的问题。高考是“举国大考”，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与影响，潘先生对考试科学性的探讨主要是针对高考论述的。他认为，高考的科学性在于考试内容和考试形式。回顾我国高考的改革历程，针对科学性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对考试科目和考试内容上，主要是将现代统计和测量理论运用到考试题目的设置，不断提高高考的信度和效度，力求高考成绩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出学生各项素质。过去的高考太过强调对学生知识的考察，缺乏对学生思维能力、学术性向、操作能力等的考察，经过长期的改革，考试科目和考试内容越来越体现出科学性，比较能够反映学生的综合素质。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高考的科学性面临着更大的挑战。那么，招生考试多样化下仍然沿用统一高考的形式能否体现高考的科学性？潘先生的答案是统一高考过于单一难以满足多样化的要求。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后，高考的功能也应相应发生变化，由以往的选拔性变成适应性，即高校和学生进行双向适应选择——高校根据自己的标准选择合适的新生，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性向选择自己适合的高校和专业。显然，单一化的高考阻碍了多样化的招生录取，统一高考已不符合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趋势^[2]。

当然，潘先生也指出不同时期公平性和科学性应该各有侧重，在现阶段，招生考试应该在公平的前提下更加突出科学。不可否认，高考是目前为止最为公平的招生考试，但是在过度追求公平的背景下，“考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尽其才”。高考制度固然在分数面前比较公平，但是人的先天素质以及后天形成的个性特征是不同的，考生在普通教育阶段所享受的教育资源并不均衡，社会和家庭环境、条件更是千差万别。仅仅凭一次统一考试就决定每个考生的命运，正是以“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表面的公平做法来包揽考生的选择，掩盖了“人尽其才”在真正意义上的公平——让每个大学生都能够接受最合适的教育，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聪明才智，把他们培养成为社会需要、个人乐业的专门人才。因此，潘先生认为高考需从单一的、统一的招生制度转变成多样化的考试制度，适合各个层次和不同类型的高校的需求。同时参考域外做法，用“素质测试+套餐考试”来代替每年一次大规模单一的、统一的高考，加入对考生思想品德、生活知识、心理特征、学术性向、思维能力、操作能力以及身体素质等的考察，测试的结果即使不作为高校录取的依据，也可以给考生提供参考，判断自己到底适合应用技术训练还是学术研究，以及选择什么类型的高校和专业进行学习深造。此一做法既能够较好地体现人性化，也能适应高校和考生双向选择的需要^[7]。

潘先生的教育考试思想是其高等教育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除了以上三方面，潘先生对科举考试、研究生招生考试也发表过不少独特的看法。相较而言，潘先生对教育考试问题所述不多，但均是厚积薄发之精论，对中国教育与考试制度的改革与发展曾经产生过并将继续发挥重要影响。此外，潘先生的教育考试思想与其他高等教育思想是相得益彰的，要想更深入理解前者，研习后者是一项绕不过去的工作。

参考文献

- [1] 郑若玲. 坚持考试改革考试——潘懋元教授访谈录[J]. 湖北招生考试 2002 (4).
- [2] 潘懋元, 覃红霞.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改革的成就与展望[J]. 教育与考试 2008 (6).
- [3] 潘懋元. 自学考试应通向农村[J]. 有色金属高教研究 1999 (3).
- [4] 潘懋元. 我对招生考试的基本看法[J]. 湖北招生考试 2002 (2).
- [5] 潘懋元. 教育与考试: 目的与方法[J]. 教育与考试 2007 (1).
- [6] 潘懋元, 覃红霞. 高考: 从选拔性考试到适应性考试[J]. 湖北招生考试 2003 (12).
- [7] 潘懋元, 陈厚丰. 从恢复统一高考三十周年说起[J]. 大学·研究与评价 2007 (6).
- [8] 潘懋元. 从科学发展观看高考改革[N]. 光明日报 2006-05-31.

(责任编辑 朱 蓓)